管中好窥书（下）

◆ 管继平

柳诒徵：才学识兼一世雄

文史学者柳诒徵（翼谋）先生，博雅宏通、著作等身，曾被吴宓赞誉为“才学识兼一世雄”。上世纪二十年代，柳先生与吴宓同执教于东南大学，查《吴宓日记》，时见“访翼谋先生”之记载，并有诗呈柳，如“平生风义兼师友，三载追陪受益多”等。以吴宓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对翼谋先生之服膺，可见柳诒徵先生的博大精深了。然而与一些同时代或晚辈的学人相比，如竺可桢、陈寅恪、吴宓、钱穆等，柳诒徵的学问似乎和他的知名度还是很不相称的。早些年若是没有复旦大学柳曾符先生对其祖父的撰文推介，我想，知道柳诒徵先生的想必更少了。

柳诒徵先生学问淹博、著述极丰，早年就有《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要义》等力作。除了文史哲之外，大凡图书目录、版本考据、方志地理、辞章义理、文字书法等，无一不精。据说，真正让柳诒徵在学问和书法大开眼界并更上层楼的，应该是他二十二岁时，至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缪荃孙的助手后多年。缪荃孙乃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于图书版本、碑版目录等均有极深之造诣，柳诒徵尊缪为师，从此学问日进，大受其益。

举凡学问上有所成就者，通常都有他痴迷而认真执著的独到之处。少年时柳诒徵有借抄《说文》之痴迷，成年后其勤勉认真的习惯依然不减。一九〇三年，缪先生奉张之洞命赴日本考察教育，还特意请柳诒徵随行。三个月考察回国，张之洞要缪荃孙拿一份考察报告出来，缪当即答应立刻进呈。其实缪考察时一字未记，回来立召同去诸人会商，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正尴尬傻眼之际，只见柳诒徵徐徐开口道，自己曾略有所记，不知合用否？缪命快快呈阅，一看不由大喜，原来旁人但忙游览，参观只是例行公事，而柳诒徵却细心考察，随处学习，所到之处，逐日详记，有关日本的教育管理、教授方法，乃至各地中小学的创设年月、经费、人数等俱一一备载。该笔记后被缪荃孙命名为《日游汇编》而刊行，可见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此后柳诒徵受缪荃孙先生大为赏识并重用，则毋庸置疑也。

张中行：晒晒太阳说闲话

差不多也就十来年的时间内，老北大的一批著名文化学人也如巨星陨落，纷纷离我们而去了。譬如像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人称“燕园三老”，但如今的未名湖畔，再也不见他们悠闲散步的背影。随着这些世纪老人的离去，基本也就为那一时代画上了句号。

说来也是偶然。生于一九〇九年的张中行，真正名噪文坛时，却已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当时他一本回忆性的随笔散文《负暄琐话》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文坛上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所谓“学者散文”一时风靡热销。随着《负暄琐话》的一版再版，他的《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也相继推出，张中行的文名逐渐不胫而走，八十多岁的老学者，忽而被称为“文坛老旋风”而“暴得大名”了。张中行先生写的“负暄”系列，取其没事“晒晒太阳说闲话”之意，忆故人，说旧事，信笔写来，宛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娓娓动听。

自张中行先生“出名”之后，我们都知道，他早年和女作家杨沫曾有过一段婚姻，后因理想信念不同而分手。五十年代杨沫创作的著名小说《青春之歌》中，那位退缩、落后，缺乏革命进取心的小说人物“余永泽”，便是影射了张中行。小说流行以后，这对张中行造成的压力非常巨大，但他始终保持了沉默。幸好那时他还没有出名，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然而“文革”时风云再变，杨沫也受到了冲击，北京市文联为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专请张中行揭发，张先生则不愿落井下石，反而写道：“杨沫同志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思想，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

此事杨沫后来获知非常感激，但张先生却视若平常。杨沫去世时，张中行也没有参加最后的告别会。有友人问之，张先生说：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

这就是张中行先生，有自己的思想，有独立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阿谀谄媚。这也是真正文人的最高贵的品质。

吴元亭：耕玉山房诗书印

朋友送我一册《珠溪文儒》，珠溪乃朱家角之旧称，水木清华，文儒辈出，最为有名的大概要算清乾隆进士、著名学者王昶了，其余如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小说家陆士谔、南社女诗人陆灵素兄妹等，皆是民国文苑的知名人物。不过，让我眼前一亮的倒也并非这几位耳熟能详的文坛名儒，而是另一位似曾相识的民国印家吴元亭先生。

为什么要说“似曾相识”？因为元亭公，即我同门师兄、印家吴友琳时常说起的先祖。吴元亭虽青浦朱家角人，但他的诗书学问以及文坛名气，最初却是在练塘镇创下的。他祖上是书香门第，收藏古砚颇为可观，有百砚楼、耕玉山房之号。后家道中落，仅读过两年私塾的吴元亭，为了生计，十五岁那年便到练塘镇的一家米行当学徒，再又到了一家中药铺乃至一家烟纸店学生意。无论在哪，好学不倦的吴元亭总喜欢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写字，吟诗作对。烟纸店的老先生，博古通今，见元亭是个勤快老实、虚心好学的敦厚子弟，便有意指点栽培他，于是每到店堂打烊，他们则店堂一角，油灯一盏，或指导他读书练字，或教他做诗填词……几年下来，资质聪颖的元亭学问大进，能诗善文，才二十来岁的他，渐渐地在练塘镇上也有了小名气。练塘镇上的文人名士，往往也是烟纸店里的常客，如王南槎、万星洲、曹漱石、钱晓洲、钱颂陆等，他们都非常赏识这位来自朱家角的年轻人，夸他诗文佳人品好，并乐于与之交往。后在王南槎的帮助下，吴元亭在练塘镇创办“延陵学塾”，练塘人看重他的真才实学，并不嫌弃他是学徒出身，所以学子纷纷以投，他的“延陵学塾”在练塘镇名声大噪。不仅如此，练塘镇的秀才钱颂陆先生，对吴元亭的才气也是赏识有加。钱家有长女钱贵我，知书达礼，待字闺中，虽有不少富家子弟前来求亲，然大多有钱无才加俗气，根本不入钱家“法眼”，然而她偏偏却看中了有才无钱的吴元亭。起初吴元亭考虑自己太穷，家中又有老母需要供养，故婚事也就暂且拖延了。设馆课徒数年后，由练塘郭南周先生作伐牵起红绳，吴元亭和练塘钱秀才之女终成眷属，喜结连理。旧时像这类因先生看中自己的学生，不惜让女儿嫁之的佳话颇多，记得民国著名文人中，如马一浮的岳丈汤寿潜就是他的恩师；还有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后，才情被商务的元老高梦旦看中，遂选为东床快婿……

吴元亭和钱贵我两人也属是“神仙眷侣”，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新婚之夜就有“闺房酬唱”，诗书互赠，传为一时佳话。

友琳兄说，先祖诗书之外，也擅篆刻，其印取法有道、学有渊源。胎息秦汉，不落俗格。在青浦，吴元亭以诗书印闻名乡邑，除读书治印外，他还喜欢听评弹和京戏。那时吴昌硕、还有“江南曲王”之称的俞粟庐皆常来青浦，俞粟庐乃昆曲大师俞振飞的父亲，也是俞建侯的伯父，因吴元亭与俞建侯交好，于是也得以拜识了吴、俞两位大师。因为元亭的书法篆刻才艺不俗，才获得大师的青睐，并亲自为其题写润例：

吴子元亭，少孤贫，家无长物，读书之暇，每喜临摹篆书，法宗秦汉，尤工刻石、刀法雄浑，盎然人古，迩年求者踵接，应酬不遑，爰拟润例，以示限制，当亦为结翰墨者所许也。……

《润例》的落款者为“吴昌硕、李平书、俞粟庐、冯超然同订”，阵容颇为强大，试想若无一定的实力，印坛和曲坛的巨擘人物，怎肯轻易为之摇笔？据友琳兄回忆，儿时在家还见过那张由吴昌硕亲笔题书的《润例》，但经历了“文革”劫难，元亭公的性命尚亦难以自保，更遑论其余？当然，正如我曾说过，有形的金银财物是容易消失的，但读书人的风气精神，却可长久流传。元亭公的嫡孙、印家吴友琳自号“耕玉斋”，闲时以诗书画印自娱，不正是传承了乃祖的诗书精神么？

摘自《管中窥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潘　真

13.职工篆刻小组

1961年，在马悦组织下，上海电影机械厂成立了“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另有“无线电研究小组”和“业余摄影小组”）。这个活动组的组长由厂里的工会主席担任，副组长才是懂书法、篆刻的高式熊。

当时，一方面高式熊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职工兴趣小组而言，这位书法、篆刻的辅导老师堪称豪华——爱好书法篆刻的学员们应该注意到，1962年，上海青年宫首创书法篆刻学习班，高式熊是与沈尹默、白蕉、拱德邻、潘学固、胡问遂、方去疾、钱君匋、单晓天等一起执教的。

十几人的活动组，每星期一个晚上，下了班留下来开展活动，主要由高式熊教篆刻。高老师指导有方，学员们进步神速。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及时得知，有这样一批从勤杂工、车工、技工到书记的篆刻爱好者在最基层活动，就邀请他们参加了那年3月举办的“上海市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会”。高式熊接到任务，连夜加班粘贴好厂里篆刻小组成员分刻的毛泽东《蝶恋花》词句的印花，每方印下都具了作者名（书记某某刻、车工某某刻、技工某某刻、勤杂工某某刻、拍照某某刻等等），第二天一早送到展览会。上海电影机械厂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学员集体创作的篆刻作品毛泽东《蝶恋花》词句，于是亮相在上海观众面前。

职工篆刻小组的新闻，吸引了上海媒体的关注。4月的一天傍晚，高式熊下班刚回到家，就接厂里通知，《解放日报》记者要采访书法篆刻活动组，连忙赶回厂里。莅临采访的记者叫陆国伟（笔名“谷苇”），总支书记负责接待，后来还在厂里拍了一天新闻照片。

4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新闻报道《一个工人书法篆刻小组》，图文并茂，加起来篇幅足足有半张对开的报纸那么大。时隔36年，1997年，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谷苇先生发表文章《印坛驰骋“老少年”》，回忆起这一段久远的往事：

五六十年代，我任职于《解放日报》，较长时间从事文艺采访，也常为报纸副刊写点小文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当局想到应该“与民休息”片刻了，一时报纸也提倡发表些“软一点”的东西。“八小时以外，还应该有点文化休息生活嘛！”——于是，“发掘”到了上海一家工厂居然有一个“工人篆刻小组”。跑去采访，工厂党总支书记马悦热情介绍说：“这个小组全靠本厂职工高式熊的辅导。”这样，就认得了高式熊先生，当时虽已不再是“翩翩少年”，但还是英气勃勃（至今还是“英气勃勃”），不过说话之间多少有点谨慎。这是当年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的通常现象，现在则已成为“事过境迁”的当事人之间相互揶揄笑谑的谈资了。这样，高式熊辅导的“工人篆刻小组”就登上了“党报”的显著版面。尽管刊出时，曾受好评，但一到“文革”自然就成了一大罪状，其罪名是：“企图把工人阶级引向封资修泥坑中去”，是“和平演变”的“一大阴谋”云云。老高自然也少不了受到批判，接着我就被送到“干校”战天斗地，从此相忘江湖十多年，直到浩劫过后才重见于海上艺坛。

此次采访、登报之后，高式熊更加出名了，外出讲课、篆刻等排满了他的业余生活。

记不清是1960年还是1961年，高式熊遭遇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回忆起来却没有一点点后怕，反而庆幸“因祸得福”，“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解决了，精神就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年临近国庆节，他骑着自行车经过中苏友好大厦门口，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小轿车相撞。人一下子翻滚到轿车前箱盖上，头与轿车的挡风玻璃相撞，挡风玻璃应声而碎，头顶喷出的鲜血染红了白衬衫。他第一次亲眼看见那么多血，而且竟是从自己头顶心冒出来的，顿时吓懵了。交警见状，迅速脱下他的手套，捂住伤口，把他送进第六人民医院抢救。

躺在急诊室里，接受了治疗，又被要求录口供、签字。夜深人静，他感觉脑子十分清爽，确认是自己骑着那辆28吋自行车和人家撞了。

8.“卖饼”大师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在扬州买了一座花园，自称为“絜园”。絜园内花木扶疏，鱼翔鸟鸣，曲径通幽。魏源侍奉老母在这里居住。龚自珍南来北往，只要路过扬州，便住到魏源的絜园里，两人在一起切磋诗文，纵论天下，其乐融融。有史料记载，两人住在一起，常常连衣衫也到了不分彼此的状态。柴萼在《梵天庐丛录》中称龚自珍：“在扬州，客默深所。默深长身，定庵服其衣衫，曳地如拖练。或大雨外出，而下衫泥湿归，则掷于帷帐间，不知为人服己服也。”

从这一逸事，既可看到两人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也可看出龚自珍对衣衫仪表等生活细节，完全不在意到了何种程度。

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是构筑在一种共同的士人情怀基础上的。他们都怀有满腔热忱，希望自己的才智能为家国所用。但他们都遭遇了不为当朝所赏识接纳的命运。魏源仕途屡受顿挫，而龚自珍也郁郁不得舒展其志。在龚自珍辞官南返后，住在昆山羽琌山馆。同是天涯落魄人，唯余须鬓同蹉跎。魏源经常到龚自珍的山馆拜访老友。在龚自珍辞世一年后，魏源编《定庵文录》十二卷，《定庵外录》十二卷；经龚橙（龚自珍之子）删削，剩下文九卷，诗三卷，凡十二卷。魏源在序言中，相信龚自珍的文字犹如“金水”，即使“锢锢深渊，缄以铁石，土花绣蚀，千百载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三代上”。用今人的话说，龚自珍学养深厚，其诗文是可以传世的。这或许是对龚自珍诗文最早而又全面的评价。

现在又一位对龚自珍思想形成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卖饼”大师刘逢禄。为何叫他“卖饼大师”？这想法萌发于龚自珍写的一首著名的且与刘逢禄直接相关的诗：“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诗中的“昨日”是指哪一天？不可考。但年代是有史书记载的。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五十九首自注：“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申受”是刘逢禄的字。时刘逢禄任礼部主事。龚自珍是如何拜刘逢禄为师的？在有关龚自珍的年谱中，只是说“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未有文字说明龚自珍是通过谁结识了刘逢禄，并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从龚自珍诗中的描述看，师从刘逢禄是一件非常畅快的思想旅程，刘逢禄的学术思想，肯定如闪电一样击中了龚自珍的神经，使得他的治学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龚自珍同时师从刘逢禄的还有魏源。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

刘逢禄，字申受，号申甫，江苏武进人。任礼部主事十二年，也曾担任考官，是今文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外祖父庄存与开创了清代的今文经学，著有《春秋正辞》，强调使用微言大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有一段轶闻发生在刘逢禄与龚自珍、魏源之间。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与魏源再次赴京参加会试，正好刘逢禄任会试的同考官，看到一卷，才气横溢，从字迹和论述风格上判定是龚自珍所写，而邻房有一湖南卷，文章质量也很高，刘逢禄认为是魏源卷，他极力向主考官推荐，但均未被采纳，两人还是双双落第。其时，龚自珍已经三十五岁、魏源三十二岁，正该奋发有为而因缘不际会。刘逢禄为此而伤感不已。龚自珍与魏源都是无愧于乃师的弟子，他们用各自的卓然传世的学术成就，把刘逢禄的“微言大义”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凝固成可以触摸的山峰。

从现有的史料看，龚自珍与林则徐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非同一般的情谊。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早建立于何时，有多种说法，有待考证。有一个可靠史实是，在林则徐临危受命，赴两广禁烟离京时，龚自珍曾为之送行，并专门写了一份建议书，名曰：《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道光十八年（1838），无论对于清王朝，还是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一个不该轻易忘记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清王朝不得不开始正视大英帝国在中国倾销鸦片带来的严重问题。而中国与外来入侵者的矛盾，从此渐渐走向白热化。最初鸦片作为药材，在明中叶即开始流入中国。南洋诸国曾将其做贡品，进奉给明廷，其量也极少。渐次鸦片与烟草混制，成为吸食品，并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沿海进入内地，吸食鸦片烟者的数量也日渐增多。